

元初之际山西地区汉人世侯的外出征戍：兼论刘黑马统辖下的契丹、女真、汉军诸部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汉人世侯是金元之际的地方武装附蒙以后，被蒙古统治者赋予执掌军政权力，外出参加征戍活动与世袭守土辖地治理，借以征服与统治中原汉地的特殊产物。灭金之中，山西地区的汉人世侯很早便在刘黑马的统辖之下外出征戍陕西、河南等地，并且发挥出重要作用。灭金以后，蒙古统治者将汉人世侯的地方武装逐步纳入刘黑马所统辖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之中。其间，蒙古统治者在采取陕西、四川右路西向的征戍格局下，不断派遣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随从蒙古军，进征南宋，使其在陕西、四川及湖北等地的军事征戍中继续发挥出重要作用。

关键词：元代；山西；汉人世侯；征服；镇戍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

灭金之中，耶律秃花与刘伯林所率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逐渐形成汉军集团的核心部分，且经不断扩充收编山西地区起家发迹的大小附蒙地方武装，最终构成有元一代汉军集团的主要力量。对于耶律秃花父子与刘伯林父子所率河东山西汉军诸部的有关问题，周清澍先生的《元恒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一文中对耶律秃花家族作过深入精辟的分析考证，文中指出，耶律秃花以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之功，封授太傅、总领也可那延，是蒙古西征后统领留在“山后诸州”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的最高统帅；刘伯林在与耶律秃花一同征讨招降山后诸州的过程中成为耶律秃花的“兵马副元帅”。^[1]这些“山后诸州”契丹、女真与汉军之中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于山西地区的西京路（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①

耶律秃花之子朱哥承袭父职以后，“仍统刘黑马等七万户”，继续担任西路军中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的最高统帅，后任驻京兆诸军主帅，具有“秦陇帅”、“宣差”、“权省”等衔。甲午（1234）秋七月，朱哥在随塔海征蜀之后，卒于军中。其子宝童嗣职袭任，且因疾病难以任事，遂由朱哥之弟买住嗣任，宝童充任随路新军总管。买住卒后，其子忽林带承嗣袭职，总辖诸军，立成都府，卒于军中，又以其兄百家奴嗣职承袭。由此来看，自朱哥至百家奴，前后均依大蒙古国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传统定制，承袭太傅、总领也可那延。^[2]

刘伯林之子刘黑马在承袭父职担任万户，佩虎符，兼都元帅以后，继续统辖山后诸州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随从蒙古军转战各地，四处征讨。癸未（1223），刘黑马从国王木华黎攻取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不克，回屯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复从孛罗攻取西夏唐兀。甲申（1224），又从按真（按陈）那延攻破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乙酉（1225），金朝降将武仙据守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叛蒙之后，刘黑马复从孛罗讨伐，攻破真定，击走武仙。金将忽察虎以兵四十万复取山后诸州之时，刘黑马逆战隘胡岭，大破金军，斩忽察虎。

己丑（1229），元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刘黑马为三万户之首，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金太傅府事，总管汉军”。这次任命不仅标志着刘黑马麾下统辖的河东山西汉军诸部

的不断增加，而且表明刘黑马作为辅助太傅的佐贰之官，可以行使太傅所享有的军政权力。在从征回回、河西诸国以后，刘黑马继从蒙古军攻破陕、甘诸地城堡。^[3]庚寅（1230），托雷入大散关，假道宋境迂回伐金，命刘黑马经陕东下。刘黑马统军进至三峰山，遇金大将合达激战，大破金军，俘虏合达，斩首数万级，乘胜攻破香山寨及钧州。蒙古汗廷增立汉军七万户时，仍以刘黑马作为第一万户。癸巳（1233），刘黑马从破汴京。甲午（1234），从破蔡州，灭亡金朝。^[4]

依照前述观点与查考史料可以发现，耶律秃花统领“万户扎刺儿、刘黑马、史天泽伐金”的“三万户”，当为《元史·刘黑马传》中所记的“三万户”，这三万户是以刘黑马作为第一万户为首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其后，这个“三万户”在蒙古汗廷扩充组建中原汉军之后变为耶律秃花之子耶律朱哥嗣统的“刘黑马等七万户”，即为《元史·刘黑马传》所记“增立七万户，仍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严实等次之”的“七万户”。尽管这些万户在不同史料中所列万户的人名不同，但是上述史料表明，耶律秃花之子耶律朱哥与刘伯林之子刘黑马二人正是根据漠北蒙古“父死子继”的传统制度，承袭父职以正、副统帅继续统辖着中原汉地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

对于刘黑马所统宣德、西京、河东诸军之内增置汉军万户的问题，赵文坦在《〈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一文中进行过专门探讨，文中提到，刘黑马统领宣德、西京、河东方面军中增置过张札古带、奥屯世英、夹谷龙古带、田雄、“天成万户纪侯”等七个汉军万户，进而将这七个汉军万户说成元初之际中原汉地的契丹、蕃、汉军“七万户”。^[5]赵文坦关于这些军队属于刘黑马麾下统领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将自己所列出的刘黑马麾下七个汉军万户说成是元初之际中原汉地的契丹、女真与汉军“七万户”，却值得进一步考证推敲。就此而论，文中除了缺少史料证明以外，似乎还存在着理解史料上的偏差。此外，他对周清澍先生关于郝和尚拔都、李守贤之子李穀应属刘黑马麾下的正确说法表示怀疑同样缺乏史料依据。事实上，刘黑马所统之军还包括属于河东山西的李守贤、田雄、刘亨安、郝和尚拔都、梁瑛、史千等汉军诸部。

对此，《元史·刘黑马传》中有两条重要史料，其一、己丑（1229），元太宗始立三万户时，刘黑马便已作为三万户之首，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金太傅府事，总管汉军。其二、辛丑（1241），刘黑马改任“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4]依照所述两条史料，刘黑马一方面是汉地诸军的副统帅，另一方面则是包括河东山西的契丹、女真与汉军诸部在内的最高统领。郝和尚拔都与李穀担任万户的年代则大致接近于刘黑马改任“都总管万户”的授职年代。《元史》记载，庚子（1240），元太宗于行在所，授以郝和尚拔都担任宣德、西京、太原（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平阳（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万。辛丑（1241），李穀在朝觐行在所后，被授河东道行军万户，兼任总管。^[6]由此推断，蒙古汗廷似在辛丑年中进行过河东山西汉军诸部的扩充组建，因而将郝和尚拔都、李穀的河东之军归属于刘黑马所统诸军万户之下。

梁瑛所部不仅是在三峰山战役中充当前锋的参战之军，而且还随蒙古军参加过征服四川的军事行动，应属刘黑马所统入蜀的河东山西汉军诸部的组成部分。《元史·刘伯林传》载到，乙未（1235），元太宗命刘黑马从都元帅塔海出征川蜀。^[4]《山右石刻丛编》中的《梁瑛碑》记载，乙未（1235），梁瑛从元帅塔海入蜀参战，遭遇宋军坚守瞿塘，难以克进。当时，梁瑛“作皮浑航以济”，因而塔海奏任梁瑛担任征行万户。《山右石刻丛编》中的《梁秉钧碑》则载，辛丑（1241），宋人复守瞿塘之江，兵不能进。梁瑛设计“以皮航因得而济”，遂破其兵，因得其地。因此，都元帅塔海以梁瑛深谋远算，又善用兵，故授万户之职。^[7]对照两碑的作记时间可以看出，后碑所立年代早于前碑，且为汾州当地教授张藻于壬寅（1242）撰文，远较魏初于延祐年间撰文更为可信。因此，后碑所载时间较为准确。就此而言，蒙古汗廷授以梁瑛万户之职的年代与刘黑马改任“都总管万户”的年代前后大抵一致。此外，癸丑（1253），史千“领平阳、太原士卒藩戍关中，俾副陕西总管、京兆尹田雄”。^[8]因此，梁瑛与史千同样应属刘黑马麾下的统领所部。

二

在征服与统治山西地区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还逐步将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纳入元代军事武装体系中的汉军集团，进而投入到外出征戍的军事行动之中。灭金之时，山西地区的汉人世侯已在刘黑马的统辖之下，先后参加过征服、镇戍陕西、河南等地的军事行动，并发挥出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大致包括有郝和尚拔都、梁瑛、史千、李佺、杨琛与杜海等部，外来汉军的汉人世侯则有夹谷龙古带、石抹高奴、李守贤、田雄与刘亨安等人。

这一时期，郝和尚拔都率兵南伐，“略地潼、陕”。[9]梁瑛攻略河东山西以后，下怀孟（治今河南省沁阳）等十余城。庚辰（1220），梁瑛受命入关，攻陕右，破栎州。己丑（1229），梁瑛不远万里，北上入觐，特授金符，宣命充任千户之职。明年，从太傅总领也可那延宣差万户扈从车驾西入长安、凤翔，西徇宋地西和、兴元（今陕西省汉中）等路。壬辰（1232），蒙古军兵进唐、邓，梁瑛在刘黑马麾下作为前锋，与金兵战于钧州三峰山，大破金军。[3]

史千从元太宗渡过黄河，“取凤翔，略汉川，破河南”。癸巳（1233），“领平阳、太原士卒，藩戍关中”。[8]李佺从蒙古军击“京兆、凤翔、泾邠等州”。[10]杨俊从蒙古军取河中、兴元，又随车驾攻河南，破蔡州，宣授千夫长，佩金符，得赐名琛。[11]杜海“国初为河东、南京等路征行先锋总官，领兵渡河直抵洛阳西南，攻破亡金”。[12]

夹谷龙古带，女真人，其父夹谷常哥是与刘伯林一起降蒙的金朝之臣。夹谷父子与刘伯林父子“来北之初，义同一体”。戊子（1228），夹谷龙古带一度从木华黎转战河东、山东。辛卯（1231），从蒙古军攻破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西南）。壬辰（1232），又大破金兵于三峰山。[13]

石抹高奴，契丹人。辛未（1211），成吉思汗军至威宁，石抹高奴与刘伯林、夹谷常哥等人献城以降。“会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遂以石抹高奴为千户。己丑（1229），石抹高奴从元太宗征伐金朝，任为征行千户，卒于军中。石抹高奴子石抹常山，袭为千户。[14]

李守贤兼任平阳路兵马都总管以后，曾以攻金“将士逗留沮挠，多所伤溺”，河中久攻不克，请自北面凿城先登，破城河中，遂构浮桥，率军经由蒲津南济潼关。[6]

田雄在征戍山西地区之后，升任千户，充御前先锋使。辛卯（1231），从元太宗至陕西，破凤翔。壬辰（1232）春，田雄“以劲卒鏖（战）三峰（山）下”，大破金军，河南遂平。癸巳（1233），蒙古汗廷诏命田雄镇抚陕西。甲午（1234），宣赐金虎符，以太原、平阳两路军皆隶麾下。[15]

刘亨安镇戍绛州以后，又从蒙古军渡河入关，进攻陕西。辛卯（1231）春，“克凤翔，历秦、陇”，屯军渭南。是秋，刘亨安又出阶城，沿汉抵邓。壬辰（1232），刘亨安“会大军于钧州，败金人于三峰山”。甲午（1234），参加扫平蔡州战役。[16]

应当指出的是，三峰山战役是蒙古军灭金之中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军事行动。在以少胜多，重创金军的这次战役中，蒙古军统帅拖雷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虽是这次战役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但是，刘黑马所率河东山西汉人世侯的奋勇作战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

在平宋中，蒙古统治者对四川的军事进攻是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其间，蒙古统治者始终派遣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作为右路军参加入蜀的作战行动。这些部将及其军队在蒙古统

治者所采取的陕西、四川右路西向的征戍格局下，不是骁勇善战，充当先锋，便是忠于职守，镇戍一方，为元朝统一全国发挥出特殊作用。

灭金之后，元太宗为了巩固北方地区的势力范围，展开征服南宋王朝的军事行动，开始派遣太子阔端、都元帅塔海攻略四川。其后，河东山西的刘黑马、梁瑛与郝和尚拔都等部将及其军队随同蒙古军反复进入四川地区，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南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军事力量，进而展开镇戍活动，建立军政权力机构，继续发挥出重要作用。

乙未（1235），元太宗命刘黑马从都元帅塔海出征川蜀。同年，梁瑛随从塔海入蜀，领军攻取阶（今甘肃省武都附近）、和、成（今甘肃省成县）、凤（今陕西省凤县）及襄阳（今湖北省襄樊）等处州县。丙申（1236）之冬，梁瑛破大安军，由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进入西蜀。丁酉（1237），远际瞿塘（今四川省奉节县）、夔府（今四川省奉节县）、巫山（今四川省巫山县）之界。戊戌（1238），又从塔海进围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逾月始下。是年，西蜀复立其城，梁瑛暨都元帅重整三军，直抵鹄（碛）门（今四川省全县西）、黎雅、木波（今青海省黄南及甘肃省甘南）。辛丑（1241）之春，成都、汉州（今四川省广汉县）宋军之将复立其城。梁瑛与先锋秃薛（突薛）那延再入其境，生擒四川制置陈公及其官属，平定成都。其间，梁瑛“三入成都，乃至而后得其地，皆始终参与其事”。^[3]

郝和尚拔都随从都元帅塔海出征川蜀，“下兴元”。宋以重兵防守剑阁，郝和尚拔都面对险隘，“募敢死士十二人，乘夜破关”，大败宋将，引军入川，沿途所攻“诸城悉下”。丁酉（1237），蒙古军攻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万军于南岸”。郝和尚拔都“选骁勇九人，遂乘轻舸先登，横驰阵中，既出复入”，因而勇冠军中，“以善战名”。^[17]甲辰（1244），受命发五路未起之兵，“复征西蜀，取重庆等处未下城堡”。乙巳（1245），军至西蜀，“所向克捷，诸城皆定”。^[18]

刘亨安从都元帅塔海征服巴蜀，“攻散关，破剑门”，进围成都。其间，刘亨安担任先锋，大破宋军于城西，生擒宋将陈侍郎，“出奇制胜，战功居多”。^[15]田雄在征蜀中，“拔成都，定五十余城”。^[18]郑鼎跟随塔海出征西蜀，“累岁从之”，“屡立战功”，还屯秦中。^[20]

李穀率平阳军随从塔海征服川蜀。戊戌（1238），进攻碛门。又明年，攻下万州，会战瞿塘，获取战舰千余艘。己巳（1245），进攻成都，由广元出葭萌（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度木瓜坡，长驱成都，破城而入。壬子（1252），李穀率军袭击嘉定（今四川省乐山）。^[21]嘉定处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诸水会合之地，是南宋在四川的“镇西之根本”。这次袭击嘉定是蒙古军进攻四川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蜀为之震动一时。

元宪宗即位以后，先后派遣蒙古军都元帅帖哥火鲁赤与纽璘等人，甚至率军亲自出征，对四川地区展开新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在这次军事征服中，河东山西的汉人世侯再次深入成都地区，初步建起军事统治政权。

甲寅（1254），元宪宗命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入蜀征讨。乙卯（1255），万户刘七哥（刘黑马）、阿剌鲁阿力与宋兵在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县）作战失利，陷入宋军包围之中，后经速哥驰援以归。^[22]丁巳（1257），刘黑马率领夹谷忙古带占领成都以后，入觐元宪宗，再次提出“立成都以图全蜀”的战略方针。为此，元宪宗决定在成都立城设署，命刘黑马“管领（成都）新旧军民小大诸务，赐号也可秃立”。此后，刘黑马一度受命往镇商、邓，而以长子刘元振摄行万户之职留守成都。

忽必烈即位以后，继续任命蒙古军都元帅纽璘、百家奴与帖哥等人巩固、扩大四川地区的势力范围。随着夺取四川地区军事征服的不断展开，刘黑马及其后人继续主持四川地区的军政事务，且对四川地区的军事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统元年（1260），廉希宪、商挺奏请刘元振担任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命刘黑马“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在夺取与稳定四川地区的过程中，刘黑马父子在招降宋将刘整，瓦解宋军的政治攻势与坚守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潼川，大败宋军之中，表现的相当出色。随后，南

宋泸州主帅俞兴率兵围攻泸州，昼夜急攻。刘元振以“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不惜“杀所乘马犒将士”，招募善游之士求援成都，权宜打造金银牌符，分赏有功将士，直至援兵赶到，合击大败宋军。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命刘黑马“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中统四年（1263），刘黑马之子刘元礼升迁兴元、成都等路兵马左副元帅。

至元元年（1264）八月，刘元礼分军戍守潼川（今四川省三台），隶属都元帅按敦统领，升迁潼川路汉军都元帅。至元二年（1265）九月，宋制置使夏贵率军五万进犯潼川，刘元礼领军数千，众寡不敌，诸将登城观望宋军，皆有惧色。刘元礼一面激励将士，一面手持长刀，大呼突入阵中，遂使将士奋勇，大败夏贵之兵，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至元四年（1267），刘元礼上言修建眉州城（今四川省眉山县），以加强对嘉定与成都之间的严密控制，后经忽必烈派人视察认可，“遂兴役，七日而毕”。此后，刘元礼镇守眉州历时五年。

刘黑马死后，刘元振继任成都军民经略使，抚定西川，防止宋军重新控制成都地区，稳定发展元统治者在西川地区的势力范围。至元七年（1270），刘元振担任成都副万户。至元十一年（1274），刘元振受命兼潼川路副招讨使。刘元振卒后，其子刘纬承袭父职担任万户，佩虎符，守潼川，创立遂宁诸处山寨，且以“从围钓鱼山，数战有功”。其后，以攻合州（今四川省合川），授任潼川路副招讨，迁副都元帅，复授管军万户，迁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后又晋升四川西道宣慰使。^[23]

这一时期，山西地区还有李恮、周允中、杨宜与孔锦山等不少部将都参加过四川地区的军事行动。其中，有些部将均以父子兄弟一同征讨，前赴后继，为蒙古统治者征服四川立下显赫战功。

乙未（1235），李恮以累功授征西千户，随从塔海进征伐蜀，入散关，收南郑，取西川。庚戌（1250），其子李鼎，袭千户，进征緇汉、嘉定立有战功。李贞，袭兄鼎爵，平定阆州，继而再定遂州、眉州、嘉定、合州，杀敌擒将，“屡建功勋”。其孙李思敬，袭千户爵，加武略将军，攻破泸州、重庆，兵镇夔州，平定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后以征讨洞蛮有功，还镇重庆。^[10]

至元七年（1270），蒙古军完成对襄樊地区的战略包围以后，忽必烈为了防止南宋从四川调军援助襄樊地区，改郑鼎为金书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事，将兵巡行东川。^[24]至元八年（1271），赛典赤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以军牵制四川宋军。抵至嘉定，捕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缴获战舰二十八艘。

李昱，字仲明，榆次人，起初服劳于郝和尚拔都。戊午（1258），授太原路奥鲁万户。至元三年（1266），也速答兒行中书省于四川，辟李昱为行中书省员外郎。其间，李昱身居幕府，“会金谷，调军食，转输供给，未尝乏绝”。甲戌（1274），四川行省拜授李昱枢密副使、行枢密院事，“分道攻嘉定”，后以“成都乃四川根本”，授成都路城防总管，通管军民大小事务。^[25]

周猷臣长子周允中承袭父爵，佩带金符，参加征蜀的军事行动，担任太原路行军总管。^[26]杨宜在从都元帅塔海西征川蜀之中，以其从弟杨琛担任先锋，“凡所攻拔，不避矢石，屡有成效凯还”。^[11]孔锦山初袭父爵为千夫长，从征讨伐累有战功，累升四川碉门等处镇守万户。其子秃鲁卜有父风，次子也先不华俱为碉门等处副千户，佩虎符。^[27]

石抹常山之子石抹乞儿袭职统领本万户诸翼军马，从都元帅纽璘进攻重庆、泸、叙诸城，数有战功。至元二年（1265），石抹乞儿从都元帅按敦移镇潼川。至元四年（1267）九月，从攻蓬溪寨阵亡，其子石抹狗狗袭职。石抹狗狗“少从征伐，以壮勇称”。至元八年（1271），石抹狗狗从金省严忠范以兵进围重庆，攻朝阳寨，率卒先登。至元九年（1272），石抹狗狗领军击退袭击成都的宋将咎万寿之军。^[14]

札古带与奥屯世英两个万户改隶刘黑马统领以后，均参加过征服四川的军事行动。奥屯世英“偕塔海都元帅累岁征南”。^[28]札古带则以河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从西征，下兴元，围嘉定，殁于军”。札古带死后，其子张万家奴于中统二年（1261）从都元帅纽璘入朝，承嗣父职，参加蒙古军在四川的军事行动。至元四年（1267），张万家奴率师“立眉、简二州”，又从也速答兒攻取泸州，大败

宋军。至元七年（1270），张万家奴从攻重庆、嘉定等地，“分兵以守之，且日出师，水陆接战”。其后，诸将攻打泸州，先后失利，张万家奴诣阙请战而出，遂率舟师一百五十艘分守江面，进而先据神臂门，登梯攻城，斩关而入。在围攻重庆时，张万家奴率军封锁马湖江，分兵水陆往来巡查。[29]

在征服四川的诸军之中，还有一支契丹人石抹按只率领的船桥水军部队。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初率汉军五百人归元太祖。戊午（1258），石抹按只统领其军，随从都元帅纽璘进攻成都，又从都元帅按敦往攻泸州，“凡立浮桥二十余所”，“浮桥之功居多”。中统三年（1262），石抹按只以立浮桥之功，担任河中府船桥水手军总管，佩金符。

至元四年（1267），石抹按只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攻取泸州，率领水军与宋将陈都统、张总制战于马湖江，“身被二创”，奋战败敌。至元六年（1269）正月，也速带儿领兵趋泸，派遣石抹按只以舟运载器械、粮食，由水道进。宋兵复扼马湖江后，石抹按只打破封锁，将粮运抵眉、简二州，资军所用。至元九年（1272），石抹按只病故之后，四川行省承制以其子石抹不老代领其军。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命令四川行省也速带儿指挥各路元军，攻取南宋四川据点嘉定。石抹不老率军从攻，以巨舰七十艘载勇士数千人，占据岷江上流。至元十二年（1275），嘉定举降之际，石抹不老追歼尽灭遁逃宋军。在蒙、汉诸军围攻重庆之时，石抹不老以战舰三百艘列阵助战。至元十三年（1276），石抹不老夜袭宋军，率部直抵重庆城下，攻千斯门，并且击败南宋涪州守将的来援舟师。至元十四年（1277），石抹不老从攻泸州，率领所部之军攻神臂门，“蚁附以登”，破城而入。至元十五年（1278），石抹不老复攻重庆太平门，率军先登，杀敌擒将，夺取战舰五十艘。至元十六年（1279），命袭父职，为怀远大将军、船桥军马总管，更赐金虎符，兼夔路镇守副万户。至元十八年（1281），大小盘诸峒蛮叛，命领诸翼蒙古、汉军三千余人镇戍施州，累任保宁等处万户。[30]

四

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山西地区的部分汉军还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展开过军事行动，其间，平阳军不仅在平宋中具有征伐之功，而且还是有元一代军事镇戍中“以北治南”的典型范例。

元太宗时，河东汉军已在湖北地区展开过军事行动。当时，河东汉军便显示出勇敢善战的军事素质。乙未（1235），郝和尚拔都“从皇子南伐，至襄阳”，宋以四十万军队迎战汉水。郝和尚拔都“领先锋数百人，直前冲其阵”。[19]

蒙哥即位以后，曾命忽必烈统领蒙古、汉军镇守中原，同时负责征服南宋的作战行动。当时，河东山西的汉军诸部主要投入到四川地区的征戍之中，因而只有部分汉军随同忽必烈进行南征。这支军队便是郑鼎家族作为统帅的平阳军，这支军队作战勇猛，名震一时，多次随从忽必烈南征北战。

郑鼎，郑皋之子，早年丧父，孤能自立，“读书晓大义”，“勇力过人，尤善骑射”。初为泽、潞、辽、沁千户。庚戌（1250），郑鼎随从忽必烈征服云南，每当遇有“据扼险要”，常常“奋身力战”。己未（1259），郑鼎又从忽必烈南伐出征，攻破大胜关，继破台山寨，陷阵勇猛，置生死于度外。为此，忽必烈劝勉郑鼎“为将当慎重，不可恃勇轻进”，特意分派卫士三百，“以备不虞”。是年之秋，忽必烈驻蹕江浒，命令诸将南渡过江。郑鼎奋勇当先，“首夺南岸，众军毕渡”。蒙古军进围鄂州以后，郑鼎“战益力”。

中统元年（1260），郑鼎以功迁任平阳、太原两路万户。郑鼎还率领过河东道兵平定阿蓝答儿、浑都海之乱。至元十二年（1275），郑鼎率部镇戍黄州。四月，元廷改授郑鼎为淮西宣慰使。至元十四年（1277），又改郑鼎为湖北道宣慰使，统领平阳、太原万户，移镇鄂州。五月，蕲、黄二州叛乱，郑鼎将兵前往征讨，战于樊口，舟覆溺死。至元十七年（1280），经过董文忠等人上言奏事，忽必烈赠郑鼎为中书右丞，谥忠毅。后加赠宣忠保节功臣、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潞国公，谥忠肃。

至元十四年（1277），郑制宜承袭父职担任太原、平阳万户，仍戍鄂州。当时，鄂州知州尚阙，郑制宜摄任府事，军政大权一手在握，“剔除弊政，消除灾异，捕盗去恶，严以正法，一郡帖然”。至元二十八年（1291），郑制宜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至元三十年（1293），元廷除郑制宜为湖广行枢密副使。元贞元年（1295），元廷有制：行枢密院添置副使一员，与郑制宜连署。郑制宜以员非常设，先任者当罢。郑制宜入朝以后，元廷特授大都留守，领少府监，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屯田事。[31]

郑制宜离开湖北地区以后，郑鼎之侄郑昂霄又以万户之长镇守武昌。[32]郑昂霄，字显卿。其父郑甫为郑鼎之弟，“勇略绝人，读书善骑射，以扈从征西有功”，历尹阳城、长子、潞城等五县。郑昂霄起初宿卫忽必烈，多次出任万户之职，征讨南方、平定动乱。[33]

“元建行省为大藩，湖广控滇、蜀，山海阻深，瑶獠之所蟠居，边报沓至，独以兵称，戍将视他省为多”。[34]在诸军中，郑氏以汉军军将之首，世袭万户率领平阳精锐部队镇戍在此，一方面显示出蒙古统治者在军事镇戍上“以北制南”的惯行措施，另一方面表明蒙古统治者对郑氏家族及其所率河东汉军的重视与信任。不过，这种重视与信任并不违背民族防范制度的贯彻执行，因为按照有元一代的设官定制，这个太原、平阳万户中照例设有“监平阳、太原军”的达鲁花赤。[35]

后至元年间，郑昂霄之子郑涛袭领其职，担任镇守武昌路平阳太原万户，后改行枢密院副使。[36]至正初年，晋南地区所立碑铭之中尚有宣武将军镇守武昌路平阳太原两路万户府万户与武略将军武昌等处平阳万户翼千户的领军职衔。[37]由此可知，郑氏家族在湖北地区的镇戍直至元末尚未改变。

在元史研究领域中，汉人世侯是个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然而，山西地区汉人世侯的有关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全面研究，其中，汉人世侯对于陕西、四川及湖北等地的军事征戍尤其如此，因而有待于更加广泛地发掘史料，以便做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 山后地区通常是指山西、河北两省内外长城之间。

参考文献

- [1] 周清澍. 元恒州耶律家族史事汇证与契丹人的南迁[A]. 元蒙史札[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 [2]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九, 《耶律秃花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 [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 《梁秉钧碑》; 卷三十一, 《梁瑛碑》, 台湾: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
- [4] 元史[M]. 卷一百四十九, 《刘伯林传》.
- [5] 赵文坦. 《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J]. 历史研究, 2000, (6).
- [6] 元史[M]. 卷一百五十, 《郝和尚拔都传》; 卷一百五十, 《李守贤传》.
- [7]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 《梁秉钧碑》.
- [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三, 《史千墓碑》.
- [9] 元史[M]. 卷一百五十, 《郝和尚拔都传》.
- [10] 汾阳县志[M]. 乾隆三十七年刊本, 卷八, 《仕实》.
- [11] 翼城县志[M].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卷二十六, 《人物》.
- [12] 蒲道源. 闲居丛稿[M]. 卷二十四, 《提领杜君墓志铭》,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 [13] 姚燧. 牧庵集[M]. 卷十六, 《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 四部丛刊, 上海: 上海书店, 1926 年.

- [14]元史[M].卷一百六十六,《石抹狗狗传》.
- [15]李庭.寓庵集[M].卷七,《故宣差京兆府路都总管田公墓志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 [16]元史[M].卷一百五十,《刘亨安传》;(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成化十一年刊本,卷十五,《绛州节度使刘公墓碑》.
- [17]元史[M].卷一百五十,《郝和尚拔都传》.
- [18]三原县志[M].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卷十三,《翼国公郝公神道碑铭》.
- [19]元史[M].卷一百五十,《刘亨安传》.
- [20]阳城县志[M].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十四,《艺文》;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 [21]元史[M].卷一百五十,《李守贤传》.
- [22]元史[M].卷一百三十一,《速哥传》.
- [23]元史[M].卷一百四十九,《刘伯林传》;卷一百二十九,《纽璘传》.
- [24]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 [25]赵孟頫.松雪斋文集[M].卷八,《李公墓志铭》,四部丛刊,上海:上海书店,1926年.
- [26]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七,《周献臣碑》.
- [27]新绛县志[M].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卷四,《名贤传》.
- [28]李庭.寓庵集[M].卷七,《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世英神道碑铭》.
- [29]元史[M].卷一百六十五,《张万家奴传》.
- [30]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石抹按只传》.
- [31]元史[M].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成化十一年刊本,卷十五,《郑公神道碑铭》.
- [32]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三,《成汤东庙记》.
- [33]刘岳申.申斋集[M].卷九,《参知政事郑公墓志碑》(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34]许有壬.至正集[M].卷五十二,《郑公神道碑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35]姚燧.牧庵集[M].卷十三,《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 [36]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四,《清风亭记》;阳城县志[M].同治十三年刊本,卷九,《选举》.
- [37]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七,《重修开福寺记》;《杨温墓碑》.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Going on Expedition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When the Jin Dynasty was exterminated, the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with their local forces went on Expedition and garrisoned Henan, Shaanxi and the other regions under the command of Liu Heima and played important part. Afterward, the Mongol rulers incorporated the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with their local forces into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under the command of Liu Heima step by step. Meanwhile, the Han Hereditary Lords of Shanxi Region were dispatched to go on expedition and garrisoned Shaanxi, Sichuan and Hubei und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s reign with Mongol army by the Mongol rulers and played important part continuousl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xi; Han Hereditary Lords; Conquest; Garrison

收稿日期: 2007-10-20;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会科学规划办 2004 项目《元朝征服与统治下山西地区的各级政权》(0437);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